

一种未来的经济体制

〔捷〕 奥塔·锡克 著

· 当代经济比较研究丛书 ·

当代经济比较研究丛书

一种未来的经济体制

〔捷〕奥塔·锡克 著

王锡君 王福民 荣敬本 译
王燕华 张钟朴 冯文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高宏凡
封面设计：式一
版式设计：王丹丹
责任校对：刘进珍

一种未来的经济体制
Yizhong Weilai de Jingji Tizhi
(捷) 奥塔·锡克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新华书店 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5 印张 237 千字

1989 年 3 月第 1 版 198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 400 册

ISBN7·5004·0409·3/F·98 定价：3.50 元

《当代经济比较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编 马洪

编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宏昌 厉以宁 禾 村 吴敬琏
陈伯林 周叔莲 荣敬本 赵人伟
高鸿业 黄范章

∞ 本书译者 ∞

前言、引言	王锡君
第一章	王福民
第二章	王锡君
第三章	荣敬本
第四章	王燕华
第五章	张钟朴
	冯文光
第六章	王锡君

出 版 说 明

为了加强对当代外国经济理论与实践的了解，我们特编辑出版《当代经济比较研究丛书》。出版这套丛书，是着眼于这些著作在对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或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有可供研究或参考的地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向全国人民提出了改革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子，以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而艰巨的任务。为了实现这一任务，我们经济工作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当然首先必须总结本国的经验，与此同时，还必须了解外国的经济理论和实践，采取分析的态度，进行比较的研究，批判错误的东西，吸取对我们有用的东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走上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企图借“国家干预”来支撑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结果并未能阻止现代资本主义的腐朽化进程，反而招致低增长率、高失业率、通货膨胀、“福利”危机等问题，从而深深陷入了困境而难以自拔。现代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决定了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庸俗性。然而也要看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利益，也在一定范围内，对于单个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某些经济过程，进行了比较认真的分

析。这些研究往往同现代化大生产合理组织和管理有关，有不少地方值得我们借鉴。

战后以来，国外的学者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大量研究。由于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先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其主要任务是解决计划化与市场机制如何结合的问题，因而这个问题也就成了经济学家所注重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这些经济学家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是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新情况和新问题，有的在不同程度上和不同问题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研究，对于我们进行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工作，无疑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至于有些著作中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则必须对他们加以批判。

战后发展起来的所谓“发展经济学”，致力于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战略和各种经济发展问题。尽管其中不少著作反映了发达国家的利益和观点，但作者收集了大量资料，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作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各种经济发展的理论，因而也可供我们参考。

我们愿和广大读者一道，本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开展对当代外国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比较研究，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努力。

本书出版前言

奥塔·锡克是中国读者熟悉的学者。他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曾引起我国经济理论界关注。

现在我们将锡克 1985 年新著《一种未来的经济体制》翻译出版，希望继续引起读者讨论。奥塔·锡克在本书阐述的思想，较之“锡克模式”又有所发展，特别是其中提出“资本中立化”设想，是他以前的著作中未曾触及的新的课题。锡克这一设想，与目前斯洛伐克的纳维尼亚国家试行“职工投资基金”颇相似。该基金源于企业利润留成，目的在于购买企业股份或进行再投资，企图借此可以使职工拥有更大经济决策权。但这一试验结果如何，以及它的普遍意义如何，都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经济编辑室

中 译 本 序

奥塔·锡克 1981 年春访华时曾就当时新出版的《人道的经济民主制》一书的主要内容作了讲演。鉴于这本书主要是针对西方读者写的，他建议这本书译成中文时改名为《民主的社会主义经济》。他还允诺专门为中国读者写一本有关经济改革的书。他离开了社会主义国家，达十几年之久。当他看到在一个具有悠久文明的社会主义中国正在从事经济改革，对他的改革理论发生浓厚兴趣的时候，他的喜悦正是难以言表。由于种种原因，这本书的翻译出版工作拖延下来了。由于他的健康原因，他为中国读者写专著的诺言也没有实现。后来他托考斯塔教授带给我这本书名为《一种未来的经济体制》的著作。这本著作是《人道的经济民主制》的简本，共有五章。为了读者阅读方便，我们改译这本书出版。原《人道的经济民主制》的第三章《市场的必要性》已经译成中文。这一章大概对西方读者已无意义，在简本中没有收入，而对我们中国读者仍有意义，所以仍收入本书。

奥塔·锡克是捷克斯洛伐克经济改革的理论家，并曾任副总理，领导了 1968 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改革，后移居瑞士，在圣加比仑大学任比较经济学教授。他在国际上一直是有争议的人物。西方有人评论他是改良主义的空想家，因为他“观点模糊”，批判苏联传统模式，又不否定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又主张

市场经济，而东方出了不少书，批判他是修正主义，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因为他主张市场经济或“市场社会主义”。如果孤立地从他的著作和谈话中找出这一段话或那一段话，找出这个词或那个词，那么，确实可以对他作出这样或那样的评价。

但是，对一个人的评价不能离开他生活的时代和环境。当他生活在西方，在为西方读者写书时，我们就不能要求他使用我们习惯于使用的语言，而主要研究他著作中的理论和思想。我觉得，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在1986年年底写的《匈牙利的改革过程：设想、希望和现实》（见《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6年第6期）把锡克列入改革的先驱者之一，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奥塔·锡克生活在原奥匈帝国经济最发达的部分捷克斯洛伐克。在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工业恢复、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提高程度都快于奥地利。但是，到了五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初，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已经开始落后于奥地利。这种现实的对照不能不使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的锡克深刻地感到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矛盾。锡克曾是《资本论》的捷文版译者和捷克斯洛伐克党校的教学工作者。自然，他熟悉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但应该说，他有理论联系实际的较好的素养和学风。他有一句名言：如果理论不符合实践，不是实践错了，而是理论错了，不应该使实践服从理论，而应该根据实践发展理论。锡克受到兰格、布鲁斯模式的影响，但也敏锐地发现了波兰经济学家的弱点，这就是忽视了利益的矛盾问题。锡克的贡献在于从利益的差别的存在和利益矛盾的解决看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的必要性。这已不是兰格模式中的模拟市场机制，而是真正涉及人们利益的市场机制。

锡克后来参与了政府的经济决策，因此，他更可以看到政府各职能部门认识能力和利益方面的局限性。他多次谈到，中央计划部门和各职能部门不可能掌握涉及各种投资和生产所需要的上百万种信息，也不可能决定千百万种商品的价格，而在实际生活

中往往发生各部门扯皮的现象，谁也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而最后扯皮没完没了的时候，只好凭谁官大，谁作出决策。尽管可以成立各种委员会，也可以听取各种专家意见，可是，谁也不承担经济责任。一旦作出错误的生产和投资决策，都可以互相推诿。主管部门权很大，但不负责任。而企业实际责任很大，但权又很小，作不了主。因此，苏联传统的全民所有制，实际成了无人负责制，而其经济后果只好由全体人民来承担。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锡克能根据实际的情况深刻地揭示这些敏感的问题，是很有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大胆开拓精神的。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思想史上应该承认的。锡克有关利益问题的著作，在本国，以及在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广泛的影响，至今仍然有研究的价值。

此外，锡克在批判旧体制的同时，指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企业自主权，正确的价格信号，利润刺激，过渡到买方市场，利用市场力量，等等。因此，锡克往往被指责为赞成“市场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者”。其实，以资源分配来划分社会主义模式，无非可以归结两大类，一类是以行政手段来分配资源，一类是以市场方式来分配资源。这两类可以再分若干子类，例如直接行政手段或间接行政手段，自发的市场方式或有调节、有计划的市场方式。从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至今已经有 70 年了。从五十年代开始，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也已经有 30 年了。总的历史发展趋势不能说还看不清楚。用行政手段分配资源，缺乏正确的价格信号，没有经济利益的承担者，必然造成需求和投资失控，宏观经济比例失调，生产和投资效率下降，微观效益降低。即使从直接行政控制转到间接行政控制，采用产值指标，利润指标，销售指标，企业仍然摆脱不了行政依附的地位，直接行政控制所造成的宏观经济失控和微观经济效益下降的情况仍然得不到解决。锡克是最早探索把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经济学家之一。通过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比较研究，他得出过一

个明确的结论，即指令性计划和市场是不能结合的，而是彼此排斥的。如果一方面用各种行政手段干预企业，另一方面又要企业面向市场，那么，很可能得到的不是两者的优点，而是两者的缺点。这就是说，企业继续要求行政机构给予各种补贴和优惠，而同时市场上抬高价格，把低劣的产品推销出去，以谋求高额利润。这样，就造成企业“只负盈不负亏”的局面，大大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因此，他坚决反对把指令性计划同市场机制相结合，而主张把宏观分配计划和市场机制相结合。他认为，在前一种情况下，不仅不能消除旧体制的弊病，反而会造成通货膨胀、经济效益下降、经济生活发生混乱；只有在后一种情况下，不仅能实现宏观经济平衡，而且能实现微观经济平衡，达到既提高宏观经济效益，又提高微观经济效益的目的。锡克的这种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模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不少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地方，但是，这种模式至少突破了社会主义和市场不能相容，全民所有制的本质就是保留指令性计划等传统观点，而且指出了推行双重体制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曾经盛行一时。但是，随着戈尔巴乔夫大力推行经济改革，这种批判似乎已经作为过时、僵化的观念而被搁置一边了。人们倒应该冷静地分析一下究竟如何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发挥这两者的优点，而不致造成这两者的缺点。

1981年奥塔·锡克来华访问讲学，正是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改革之路的时候。在经历了长期的闭关自守和思想禁锢以后，我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随着经济的开放，各种经济思潮和经济流派都在我国介绍，经济学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各国经济学家纷纷来华访问，介绍他们的思想，并对我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提供各种各样的咨询和建议。在众多经济学家中，布鲁斯，特别是奥塔·锡克曾对我国经济理论具有较大影响。原因是：

1. 我们的改革是在社会主义框架内进行的。东欧的经济学家

在这方面有深刻的理解，他们的理论都是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的，因此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特点。

2.苏联、东欧和我国的原有经济体制有共同点，都是高度集权的行政计划管理体制，在理论上都来源于斯大林模式。他们对斯大林模式和苏联旧体制的批判性分析，常常可以引起我们的共鸣。他们说的是苏联和东欧，但好象也就是说我们中国，说的正是“阁下”的事。

3.他们曾经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后来移居到西方，能对两种制度进行比较，特别是对计划体制和市场机制以及与此有关的各种理论进行比较，并且进行长期的研究和探索。这些理论和实际知识对我们是有用的。

4.他们亲身参加过改革，锡克还领导和设计过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对东欧和苏联的改革进行长期跟踪研究。改革中有成功、有失败。这种亲身的经历和饱尝的辛酸，对我们刚投身于改革的人们来说，显得特别亲切和宝贵。

不管怎样，锡克的著作总是东欧经济改革的某种反映。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东欧经济改革一度走在我国的前面，作为后改革者自然要吸取先改革者的经验教训。锡克对我国经济理论界和经济体制改革发生较大影响的主要有下列问题：

1.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框框，特别是关于所有制和商品货币关系的理论，为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和新的经济体制找到了某些理论依据。

2.确定了新体制目标的基本构思：①企业的独立商品生产者的地位；②有调节的市场机制；③完善的宏观控制。锡克大体上已经论证了三个环节相联系的思想。当然，在以后我国经济学界的讨论中，已经超出了锡克的思想。例如，在市场机制方面，不仅涉及生产资料市场，而且涉及资金市场、劳动市场等等。在宏观控制方面，不仅涉及国民收入分配问题，而且涉及财政金融体制和财政金融政策等一系列问题。但从新模式的基本框架来说，同

锡克的模式有类似和共同的地方。

3.从旧体制到新体制过渡必须有总体设计。锡克根据苏联和东欧改革经验曾反复地论证过一点。他用的交通规则改革必须同时生效的通俗形象的例子给我们以深刻的印象。尽管我们在实际生活中仍处于双重体制中，即一部分车辆仍在左行，一部分车辆仍在右行，或者同一车辆，有时左行，有时右行，这对整个经济运行产生种种复杂的影响，但这只能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东欧经济改革理论家的某些预言的价值。当然，对改革的复杂性，特别是对象我们这样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大国的改革的复杂性，是他们所不能预料的，我们应当有所发明，有所前进，但似乎并不能因此就否定经济运行同步配套性的客观规律，而只能根据自己的国情研究实现这种规律性的客观途径。

4.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必须遏制总需求膨胀。这是锡克比别的任何经济学家都特别强调的，这也是他在领导捷经济改革中得出的深刻教训。锡克是研究利益问题的专家。他懂得必须从原有的行政利益惯性转到真正反映社会需求和成本消耗的新的市场利益轨道上来，因此，在模式转轨时，必须首先抑制原有的利益机制，抑制旧体制固有的投资饥渴和工资奖金攀比效应，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市场效应，使新的利益机制起作用。他甚至断然建议，在改革开始时不能随便增加工资和奖金。在旧体制下本来已经存在着宏观比例失调和微观效益降低的现象，存在着短缺和卖方市场，如果再刺激需求，那么势必加重供不应求的局面，因而造成通货膨胀，价格上涨，使广大群众对改革产生不满。相反，遏制已经膨胀的需求，市场供应情况发生好转，会使广大群众对改革建立信心。锡克语重心长的意见给当时的我国经济学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就在锡克访华时已经出现了滥发奖金的现象。不过，在我国经济改革中，这个问题比锡克想象的似乎要复杂得多。总需求膨胀的现象不断发生，这究竟是公有制下的一种常态，还是旧体制下的一种变态，经济改革究竟要在较松宽的情

况下进行，还是只能在总需求膨胀的情况下进行，目前在我国经济学界还有争论。看来，只有在有限的买方市场下，市场机制才能起到鼓励竞争，提高效益，改善经营，采用新技术，面向消费者的积极作用，这是经济学上的定则。如果违背这个定则，总要受到惩罚，其结果或者是回到行政控制的老路，或者听任市场机制发生抬高价格，粗制滥造，浪费资源，欺骗顾客等等消极作用。至于在我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如何运用这个规律，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5.锡克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价格改革。在价格改革中，他主张先调后放。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理论家中，锡克是明确主张向自由价格过渡的。因为只有实行自由市场价格，才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合理分配资源的积极作用。在这方面，锡克的理论是彻底的，是贯串始终的。但是，在农产品的价格上，锡克是谨慎的。农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不同，它取决于自然条件因素较多，而且又是人民最迫切需要的。因此，农产品特别是粮食、油料、畜产品的价格等就不能完全凭市场供求规律左右，这里必须有国家的干预，国家必须用财政手段保持农产品价格的相对稳定，维持农民和广大消费者的利益。我国这方面的情况似乎比锡克说的要复杂得多。东欧某些国家向自由市场价格过渡基本采取三种形式，一种是固定价格，一种是浮动价格，一种是市场自由价格。但是，这是就不同产品而言的。而在我国经济改革中，同一种产品既有固定价，又有浮动价，这是由我国目前实行双重体制和价格双轨制所决定的。这种体制的利弊得失，近几年来，在我国经济学家也有过反复争论。看来，一物多价（一种是市场价格，一种是行政价格），这终究是权宜之计，特别是工业生产资料和制成品涉及成千上万种，一物多价必然造成经济生活的混乱，而如粮食等少数农产品的价格情况则有所不同，它们本来需要有国家的有力干预，而且也能实现这种干预。

最后，还想说明一点，在锡克论著中当时没有着重介绍的是

他的资本中立化思想，即他在本书中有专章说明的合作股份公司设想。提起资本似乎总有资本主义之嫌，所以避免提资本一词，如我们称资本市场为资金市场，称资本建设为基本建设。细想一想，恐怕也不尽然。例如，我们经常讲投资，在外文中也是投入资本之意。可见，在实际经济生活中表示存量概念的“资本”是客观存在的。社会和个人要富裕起来，就要鼓励人们进行积累，增加存量和投入，提高积累率，并提高这种存量（或资本）产出率。随着当代技术进步日新月异，存量（资本）的概念有了很大的发展，资本已经不限于机器、厂房，而且发展到知识和智力。众所周知，知识的积累、知识存量的增加，即智力投资对科学发明和技术进步有决定性的作用。在原来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不重视这种投资的收益率和报酬率的研究，看来是片面的。锡克提出资本中立化的概念，是为了鼓励人们积累和投资，关心资本收益率，同时又要避免资本成为剥削别人劳动和知识的手段。因此，这个问题是值得研究的。至于他提出的合作股份公司设想，能否既避免资本主义企业的剥削，又避免工人自治企业在资本积累上的缺陷，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至少，锡克提出的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中还没有完全解决，因此，他的设想可以作为研究这个问题的参考。

总的来说，锡克思想对我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改革是有所借鉴的。我国的某些改革主张是同锡克的思想一致的，也有一些改革主张和做法则同他的设想不同，其中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锡克本身的思想有局限性，需要进一步修正或发展，另一种情况是锡克的主张有合理性，而人们没有充分重视和研究。无论哪一种情况都说明，包括锡克在内的有关苏联和东欧经济改革的理论和主张都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回想在锡克访华后，曾经出现过“锡克热”，国内许多报刊大量介绍锡克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甚至使某些人有一种错觉，似乎锡克已经提供了一张现成的药方，大概药到就可以病治了。但

是，时隔不久，当一时强调社会主义公有制必须坚持指令性计划时，锡克又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了。锡克在批判教条主义，反对僵化体制时可能说过一些过头话，自然也可以从中找到某些依据。风向一变，“锡克热”很快就冷却了。

这种冷热病的后果，就是对东欧经济改革理论家的思想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从而影响我们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和借鉴。1982年滥发奖金受到了遏制。到了1984年，在刚刚着手经济体制全面改革时却出现了宏观失控，总需求过度膨胀，这是改革的“大忌”，我们似乎没能避免。如果我们认真研究一下东欧改革理论家的一些意见，那么，是否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呢？应当说，特别是锡克根据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经验曾一再发出过警告。看来，我们应当重视经济改革理论的研究。此时此地，彼时彼地不断发生的问题可以使人们从中找出某些规律性，使人们能预见到将要发生的事，以及如何采取正确的预防措施。用“试错法”来进行改革，忽视改革理论的研究，终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锡克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我衷心希望上述提到的一些问题都已经成为历史，我国经济改革正在顺利发展。只是作为曾翻译和介绍过锡克著作并参加接待锡克访华的历史见证人，似乎觉得有必要把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向读者说明一下，好作为读者阅读这本书的参考。

我们介绍和研究包括锡克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理论家和各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并不说是要人们去照抄照搬他们的理论模式，而要去弄清他们理论观点产生的历史背景和这些理论观点在我国的适用度。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这样，可以看得更清些，可以看得更远些。

荣敬本

1987.10.24.

前 言

本书说明一种新的经济模式，这种模式既可代替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又可代替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本书是以我的《人道的经济民主制》一书（汉堡克瑙斯出版社 1979 年版）所详加阐述的原理为依据的，不过，原书中的各种数学公式和数学表述方法一律删节了。删去这些东西，本书就可以适应更广大读者的需要。

我知道，阐述一种理论上的经济模式同在经济实践中实现这种模式，这二者之间横有一条十分漫长而又艰难的道路。然而，每一重大的经济改革总是以某些早在实际的改革运动之前就形成的思想为起点。历来，只有那些符合大多数居民的经验和利益，符合他们的愿望和意图，并能鼓舞他们去采取政治步骤的社会思想，才能实现。

这里阐述的思想是否符合这种利益，只能由未来加以证明。为了适应某种相应的利益，我尝试从理论上说明实现某种全面的经济改革的可能性，这种改革将有助于在保持必要的经济效率的条件下扩大人民的民主自由和实现人民的社会生活的人道化。

、奥塔·锡克

1985 年 2 月于圣加伦